

中東歐與台海兩岸關係

鄭得興

一、前言

對當代的中東歐國家而言，歐洲機制至少起源自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歐盟的前身與北約組織對抗蘇聯的經濟互助理事會與華沙公約組織。隨著冷戰關係的和緩，至少自1980年代及往後歐洲聯盟一連串的組織改造，皆深刻影響中東歐政治、經濟及社會之轉型。中東歐在新歐洲機制的整合架構下，歐洲化在過去二十幾年來，一直牽引著中東歐的發展。於此同時，在中東歐地區的台海兩岸關係也起了變化。冷戰結束後，台灣才有機會向中東歐發展。儘管中東歐的台海兩岸關係有歐盟架構下的機制與規範，例如「一中政策」與「對中國的武器禁運」等，不過中東歐有許多國家跟台灣發展了相當親密的「實質關係」。

中東歐自1989年社會（民主）轉型以來，至2013年已陸續有11個前共產國家加入歐盟。而正當舊歐洲因金融危機陸續出現政治經濟社會治理問題，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東歐各方面的發展成就卻備受肯定。此外，由於中東歐的政治變革，卻意外引發一場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競爭局勢。冷戰期間，台灣與中東歐毫無互動往來，1989年之後台灣當局極力爭取與中東歐建立雙邊關係，甚至1999年短暫地與馬其頓正式建交。1989年至2008年是台海兩岸關係在中東歐競爭最激烈的時期，中國大陸、台灣與中東歐三方形成

複雜微妙的互動關係。

（中）東歐國家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追隨蘇聯，與中國凍結關係。1970年代後中國為恢復與（中）東歐傳統友誼，推動高層領導互訪，恢復正式外交機制，維持（中）東歐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台灣則是利用民主與經濟成就，試圖說服冷戰後的中東歐與台灣建立文化與經貿往來，於是1990年初期台灣即在匈牙利、捷克及波蘭設立代表處，並獲得不少中東歐新領導人（如波蘭華勒沙及捷克的哈威爾）的支持。2009年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兩岸在中東歐的零和競爭較為緩和下來，但隨著中東歐在歐盟架構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中國大陸於2013年在羅馬尼亞首都召開與中東歐十六國的高峰會議，並提供一百億美金作為中東歐發展基金。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選舉，都是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攸關歐盟未來發展的重要事項，新歐洲機制與中東歐的未來有何關係？而在中東歐與台海兩岸關係的回顧後，未來展望又如何？本文主要嘗試從歐盟、中東歐、台海兩岸三個角色互動中，勾勒中東歐與台海兩岸關係的過去與未來。

二、二十世紀「（中）東歐」歷史變遷與台海兩岸關係發展回顧

十九世紀的東歐國家分屬不同歐洲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

國)的統轄領域,一次大戰結束後(1918),四大帝國解體,許多東歐民族國家獨立。此值中國北洋政府時期,即使段祺瑞政府參與一次大戰,而讓「中華民國」擠身為戰勝國之列,卻因為對日「二十一條款」的喪權辱國,北京政權的外交政策並未獲得民眾支援。到「北伐」成功(1928)的這段期間,北洋政府與東歐新獨立國家的外交關係互動,目前的學術研究並不多見。至遲到南京的國民政府已在東歐一些國家設館,並有實質的外交關係。事實上,中華民國與東歐國家的外交關係是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政權。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東歐國家陸續成為蘇聯集團的社會主義國家(1945-1948),此際正是中國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在第一時間承認中共政權,並與之建交(中匈是1949年10月4日建交,中波是10月5日,中捷是10月6日,中斯沿用10月6日)。¹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同時也中斷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接著國際政治進入冷戰格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跟隨美國的西方集團,對抗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歐。中共政權與東歐集團的蜜月期主要在1950年代,1960年代隨著中國與蘇聯的交惡,東歐國家也與中共政權疏離。直到1970年代末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才逐漸好轉,不過1989年東歐共產國家紛紛民主化,1990年代正當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係進入調整時期,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重新回到(中)東歐國家尋找外交關係的可能性。基本上,台灣在(中)東歐國家關係的建構上,成果豐碩。不過,這不是中華民國來(中)東歐「續舊」,而是台灣總體政經成就(民主化與經濟成就)嶄新地贏得了(中)東歐國家的實質回應。

民主化的(中)東歐前共產國家在1990年代積極脫俄入歐,歐洲聯盟為因應東擴,陸續完成馬斯垂克條約(1993)、尼斯條約(2001)等,設定東歐國家入盟的政治經濟條件,1990年代的(中)東歐國家是在歐盟架構下的「重返歐洲」。台灣對西歐儘管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對西歐的實質交往未曾中斷,1990年代台灣進入中東歐是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內要求「務實外交」的具體展現,但台灣政府是否有歐盟架構下前進中東歐的整體策略,很難說個清楚。不過,隨著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2004),以及對台灣關係的實質友善之下,台灣的歐盟框架(舊歐洲+新歐洲)關係更形完整,並且相對於台灣與西歐的雙邊關係,中東歐給予台灣「外交」的實質協助更形顯著。1990年代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雙邊關係因為政治制度與意識型態的轉變,而進入雙方關係的重新調整時期,中國依著舊社會主義國家的情誼,延續雙邊的友好關係,同時加強雙方高層人事的互訪,以防止台灣的「見縫插針」。

三、二十一世紀初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零和競爭

1990年代至2008年的李登輝與陳水扁總統任期內,兩岸關係的零和博弈事實上亦延伸到中東歐的新戰場上。台灣的彈性外交策略在中東歐不斷有所斬獲,台灣利用中東歐新民主政權之初的不穩定,與新政權的民主道德要求,成功地在1990年代在中東歐國家新增外館,與推動(非正式)外交活動。台灣於1990年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設立「台北商務辦事處」,這是台灣在中東歐地區設置的第一個代表處,1995年更名為「駐匈牙利台北代表處」;1991年12月設立「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992年12月設立「駐波

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992年1月台灣與拉脫維亞建立領事關係，但在中國的抗議之下，於1994年7月終止領事關係，並在1995年建立「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兩岸外交爭奪戰最激烈的演出莫過於1999年台灣竟成功地爭取與馬其頓建交，後來在中國強烈抗議台馬建交，與威脅在聯合國針對海地動用否決權的情況下，台馬雙方於2001年中止外交關係。²

1990年代台灣積極重返聯合國，台灣政府強力運作友邦在聯合國大會為台灣的「中華民國」發聲，唯一非邦交國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支持台灣的國家元首是捷克的哈維爾總統，他在1995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甚至支持二個中國。哈維爾甚至不顧中國大陸的反對，在1995年同意台灣行政院長連戰訪問布拉格。³台灣此際對中東歐的外交策略應用相對靈活，因為台灣在中東歐地區原本即無任何基礎，此時能爭取到的外交資源都算是正面成果。然而，中國大陸在前東歐集團中，有固有的社會主義情誼。因此，在1990年代的中東歐區域分化之中，不管新國家分裂之後的規模再小，中國都以最快的時間內建立或恢復雙方的外交關係，並設立大使館，例如斯洛伐克大使館、以及幾個前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國家（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塞爾維亞及波黑共和國等），都盡速成立大使館，以防止台灣的積極介入。中國要求中東歐國家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分割的一部分，並承諾不與台灣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以及不與台灣進行任何官方往來。

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外交競爭是相當激烈的，儘管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官方互訪相對於共產時期，已經是相當密集、頻繁，但後冷戰格局的變遷提供台灣更多機會在

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獲取更多的「實質資源」。因為許多中東歐後共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是前政治異議份子，他們曾受過共產政權的迫害，因此當他們擔任政府官員的時候，比較同情台灣的國際處境，並願意與台灣交往。這些中東歐國家以維榭葛拉德四國集團（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最重要，至今為止，台灣在中東歐關係的格局仍難以突破維榭葛拉德四國集團的主要範圍。相對於中國在中東歐所有國家都設有大使館而言，台灣在中東歐地區僅在拉脫維亞（兼轄愛沙尼亞及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兼轄羅馬尼亞）、波蘭及匈牙利（兼轄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科索沃、波士尼亞與赫賽哥維納）設有外館（辦事處），其他如阿爾巴尼亞由義大利外館（辦事處）兼轄，保加利亞及馬其頓由希臘外館（辦事處）兼轄，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由奧地利外館（辦事處）兼轄。中國在1990年代經濟深化改革之際，有許多移民至中東歐謀生者，其中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及捷克等國家的中國僑民都在數千至數萬不等，相對於台灣在中東歐各國的僑民各只有二、三百人而言，台灣的外館數目與規模也算是合理。中東歐對於台灣人民而言，不僅距離遙遠，社會文化也深感生疏，因此除了文化教育的交流，以及尋找貿易生機之外，台灣在中東歐的「勢力範圍」實難再有大突破。2008年以後台灣的政權更迭、歐洲金融風暴、中國大國崛起等因素影響之下，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零和競爭已緩和下來。

四、新歐洲機制與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新務實與挑戰

2009年上半年由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捷克以主席國身分將台灣免簽案提到歐盟的亞洲

事務會議中討論，並在後續的議決中協助台灣最終獲得申根區域的免簽。馬英九總統以活路外交作為務實外交的新詮釋，以對話突破以往的對抗，繼英國（2009）及愛爾蘭（2009）給台灣免簽之後，歐盟再提供台灣申根免簽（2011），最終影響美國亦提供台灣免簽（2012），目前台灣獲得免簽的國家數目已達 129 國。台灣在中東歐的外交思惟已逐漸由舊務實作為轉到新務實的做法，由於在與對岸的外交休兵下，台灣似乎取得更多的外交突破，不過台海兩岸在外交的競爭狀態是很難完全停止的。

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後，隨其國內經濟的發展，並在2008年的歐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崛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日愈顯著，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且是歐盟的最大交易夥伴國。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以大國政治為主，中國重視歐洲傳統強國（英法德）的外交關係，中國與歐洲聯盟的互動亦相當頻繁。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共產時期是因為意識型態的結合，而儘管中國在1990年代後對中東歐國家表面上看來仍相當重視雙邊的關係，但實際上中國並未投入太多資源在中東歐地區。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相當少，甚至中國在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往來中，中國出口中東歐的貿易額遠大於從中東歐國家進口的貿易額，例如2012年中國與匈牙利的貿易額為 80.6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匈牙利的貿易額為 57.4 億美元，進口為 23.2 億美元。捷克是中國在中東歐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國，2011年雙邊貿易額為 99.9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 76.7 億美元，進口 23.2 億美元。2012年，雙邊貿易額為 87.3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為 63.2 億美元，進口 24.1 億美元。相對於中國在中東歐的貿易順差營利，過去又不重視中東歐的投資，台灣對於中東歐的投資明顯較高，尤其是台灣的電子產業大都從歐洲其他國家（愛爾

蘭及北歐）轉移到中東歐（捷克、波蘭、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等）。台灣企業對中東歐的投資，也算是台灣政府在經營中東歐雙邊關係的重要憑藉。

在中國崛起之後，中國挾其雄厚的資本重新思考對中東歐的雙邊關係，2012年9月6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秘書處，並設立了總額100億美元的中東歐國家專項貸款，再透過該專項貸款推動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簽署多個合作協定。2013年11月26日中國總理李克強於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會晤了中東歐十六國家領袖，會中共同制定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其中有八項重點：一、每年舉行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梳理合作成果，規劃合作方向；二、根據合作發展情況，適時考慮制定中期合作規劃；三、促進投資經貿合作；四、擴大金融合作；五、推進互聯互通合作；六、拓展科技創新環保能源領域合作；七、活躍人文交流合作；八、為鼓勵和支持地方合作，將地方合作作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重要支撐之一。李克強並在11月25日與塞爾維亞及匈牙利的總理，共同宣佈合作興建塞匈鐵路，連接二國首都貝爾格勒及布達佩斯，並以中國製造的鐵路裝備作為合作的主要產品。⁴

中國以大國姿態提供一百億美元作為中東歐國家專項貸款，至於中東歐十六國則依照中國的「定義」，涵蓋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立陶宛、馬其頓、黑山、波蘭、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及拉脫維亞等國，⁵這些國家都是前共產國家，其中包括已加入歐盟的國家，也包括正準備加入的候選國及申請中的國家。中國的「一百億美元」加上「中東歐十六國」的雙重組合，既

是中國大國政治的體現，亦是中國在中東歐外交事務上的新務實作法。相對於過去僅透過高層互訪以維持雙邊關係外，中國這項貸款既提供中東歐及中國中小企業，也加強中國製造業對中東歐的輸出。中國目前在中東歐的貿易額總體來說並不大，然而就中東歐在整合加入歐盟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言，未來這是一塊大市場，中國所提供的一百億美元貸款不僅期望能達到前述的八項目標，也希望能從中東歐這個新興市場有所獲利。此外，中國主要是以「一籃子外交」（將中東歐視為一整體，而施以外交作為）手段，來促進中國與中東歐十六國的雙邊關係。

台海兩岸在中東歐從過去的零和博弈走向目前各自為己尋找利基而努力，雖不曾真正外交休兵，但也不至於像過去（2008年以前）雙方在中東歐「新戰場」上的劍拔弩張。台灣向中東歐不斷深化經濟及文教的實質交流，除已透過中東歐途徑而獲致申根免簽外，台灣經濟實力前往中東歐投資，亦放眼全歐洲市場，中東歐作為台商投資及進軍歐洲市場的橋頭堡。台灣在中東歐的最大挑戰是拓展新外交領域上的障礙，台灣在中東歐沒設置外館（辦事處）的國家大都對台灣不甚瞭解，甚至不太友善。台灣企業及外交人員前進這些地方，所遇到的阻礙也較多。此外，台灣在面對歐洲整合的架構下，似乎仍欠缺更明確、更具整體性的中東歐外交發展計畫。相對於中國從過去的消極外交作為，走向今日積極外交作為的務實作風，中國運用大國政治的操作資本確實比較具有影響力，不過中國的大國政治是否會遭遇中東歐國家的更多疑慮，或許是潛在的障礙，這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要處理的問題。另外，中國亦須努力改善其僑民在中東歐國家的社會地位及保護僑民，透過僑民為中國

鞏固整體國家的區域利益，這也是未來的重大挑戰。

2014年歐盟最重要的事項莫過於歐洲議會選舉，以及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改選。這二項選舉結果攸關歐盟未來深化整合的走向，相較於過去歐盟執委會主席是由各國領導人于歐盟高峰會議協商決議的方式，2014年則由歐洲議會最大黨領袖（歐洲人民黨，EPP）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透過歐洲議會推選，並獲得歐洲理事會的通過，即將在11月接任歐盟執委會新任主席。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的特色包括右派勢力的抬頭、歐洲議會選舉的民主化、及歐洲議會的投票率依然低落等。歷經金融風暴的歐盟，明顯地更形分裂出二個反對陣營，其中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對歐盟繼續深化整合即表示不予認同，儘管支持歐盟深化整合的容克順利當選歐盟執委會主席，但面對新興的疑歐勢力，歐盟深化整合仍是未來歐洲新機制下的最大挑戰。

從剛結束歐洲議會及歐盟執委會主席選舉後的歐洲新機制來看中東歐的未來發展，至少有以下幾點意義：（一）歐洲整合（一體化）仍是未來趨勢：目前除了11個前共產國家已加入歐盟之外，正等著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尚包括阿爾巴尼亞（2014.6.24為歐盟候選國）、馬其頓（已申請加入歐盟）、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共和國等（以上是有潛力加入歐盟的國家）。（二）歐洲議會及歐盟執委會的改革，有助於提升中東歐國家的影響力：歐洲議會權力的強化及歐盟執行委員的任命，皆有助於中東歐國家表達其國家利益的機會。（三）不過中東歐仍是歐盟的勢力邊陲：以此次角逐歐盟執委會主席的五個政治人物而言⁶，皆為舊歐洲的傳

統勢力，亦即歐盟的核心勢力仍是圍繞在布魯塞爾周遭的國家。（四）新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整體經濟實力與歐盟平均的差距仍大，如何平衡歐盟內部的東西發展，仍是歐盟要正視的問題。整體來說，未來五年新歐洲議會及歐盟執委會期間的中東歐，其政治影響力不會有太多變化。不過，中東歐國家藉由歐盟各項發展基金，及其他歐盟機制設計，如歐盟流輪主席國等，以促進中東歐國家的經濟社會建設，及提高政治作用是有一定的幫助。長期而言，中東歐國家，尤其是V4國家是有可能逐漸成為歐盟的新興勢力，並在歐盟核心的布魯塞爾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在歐盟新機制之下，中東歐仍居歐盟勢力的邊陲地帶。儘管如此，中東歐在歐盟新機制之下對台海兩岸關係仍有一定的功能定位。比如，歐盟雖強調一個共同對外政策的目標，實際上仍有相當一段距離。以2003年歐盟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分歧，就可知歐盟共同外交政策目標仍不易達成。歐盟28個會員國都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但一些中東歐國家對待台海兩岸關係仍具較大的彈性，如台灣獲得申根免簽的策略，亦即利用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藉以安排議案之機會，並避開了歐盟一個中國的政策適用下，而成功推動歐盟給予支持台灣的申根免簽。2008年捷克雖在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的共同政策下，仍通過販賣雷達系統給中國，最後因美國的阻止而作罷。理論上，中東歐在新歐洲機制下，應該可獲得更多表達意見及利益的機會，台海兩岸皆有可能將中東歐作為前進歐盟的重要跳板。

五、結論

從歷史脈絡而言，台海兩岸政權與中東歐的雙邊關係發展是波折前進，早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即與中東歐新興民族國家建有邦交關係。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冷戰格局，中共政權與中東歐同屬社會主義陣營而互有往來，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即與中東歐斷絕關係。不過，隨著1960年代中蘇交惡，中共政權也與中東歐關係迅速凍結。直到70年代及80年代雙方關係才有起色，隨即遇到中東歐民主革命，90年代成為中國與中東歐關係重新調整時期。全球化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發展，台灣政府的務實外交讓「中華民國」又有機會重返中東歐。90年代及21世紀初期的中東歐是台海兩岸零和博弈的新外交場域，在這波競爭中，台灣在中東歐的外交表現頗有斬獲。中國以高層互訪及廣設大使館的方式鞏固與前共產國家的傳統友誼，台灣則以民主成就與經濟資源拉近與中東歐的距離。

經過1990年至2008年期間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外交零和競爭，2009年以後台海二兩岸在中東歐的競爭逐漸和緩，雙方的新務實作風為台灣贏得歐盟申根免簽，中國也以大國崛起之姿，統合外交資源投注中東歐的整體利益考慮，中東歐是台海兩岸關係的延長戰線及延伸領域。中東歐民主化之後，以回歸歐洲做為國家核心利益的目標，2004年以後中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盟，中東歐從過去歐洲強權地緣政治的邊陲，而成為現在進入歐盟區域的橋頭堡。台海兩岸在現今中東歐新地緣政治經濟重要框架下，都採取

了較務實的做法，以促進各自在中東歐的國家利益。

今年（2014）歐洲議會選舉及歐盟執委會主席的產生方式，都成為未來歐洲新機制的試金石，其中特別攸關歐洲整合的發展。在歐洲新機制啟動之下，歐盟的東擴仍是既定方向。不過，中東歐在歐盟架構內的戰略地位並沒有太大變化，主要還是位處布魯塞爾的勢力邊陲地帶，但對台海兩岸關係仍有重要的影響力。因為，歐洲新機制所帶來更民主的意見表達方式，以及歐盟未能形成共同外交政策的情勢下，中東歐國家作

為前進歐盟及自主利益表達的方式更具彈性。因此，在歐洲新機制下，中東歐可能成為台海兩岸共同前進歐盟的跳板。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發展剛好見證了二十世紀之後的兩次大戰、冷戰及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如今中東歐在歐洲新機制之下，逐漸深化整合進入歐盟體系，台海兩岸關係在中東歐地區也從零和競爭轉為各自爭取最佳利益，並巧妙運用中東歐作為前進歐盟的跳板。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註釋：

1. “中國同斯洛伐克的關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24/sbgx_607428/ (2014.5.18)
“中國同匈牙利的關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568/sbgx_607572/ (2014.5.18)
“中國同波蘭的關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6722/sbgx_606726/ (2014.5.18)
“中國同捷克的關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6992/sbgx_606996/ (2014.5.18)
2. “中共再向馬其頓施壓”（中時晚報，1999.2.3）<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Macedonia/88020301.htm>(2014.5.18)
3. “中國同劇變後的中東歐國家發展雙邊關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2159_611322/t8994.shtml(2014.5.18)
4. “李克強訪中東歐推銷高鐵核電裝備，中國參與塞匈鐵路建設”，http://www.guancha.cn/Project/2013_11_26_188353.shtml(2014.5.18)
5.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全文）”，<http://www.jqgc.com/jmda/41957.shtml>(2014.5.18)
6. 這五個有資格競選歐盟執委會主席的人選包括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盧森堡前首相；舒爾茲（Martin Schulz），德國籍，歐洲議會議長；凱勒（Ska Keller），德國籍，代表歐洲綠黨；伏思達（Guy Verhostadt），比利時籍，代表歐洲民主自由聯盟；希普拉斯（Alexis Tsipiashe），希臘籍，代表歐洲聯合左派黨團。